

国学知识普及读本

中华国学

夫国学者，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於国家之存亡，是不亦视前世尤岌岌乎！

章炳麟



张岱年 汤一介 庞朴 主编

中华国学 史学卷

新世界出版社

中華國學史學卷

張岱年

湯一介

鹿朴

主編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国学·史学卷/刘起钊等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6. 8

ISBN 7 - 80228 - 026 - 5

I . 中… II . 刘… III . 国学 - 中国 - 普及读物 IV . Z126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9387 号

中华国学(史学卷)

策 划:郭林祥

作 者:刘起钊等

责任编辑:郭林祥

封面设计:一 直

版式设计:石映照

插 图:王凤阁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10)68996306

印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87 × 1092 1/16

字数:550 千字 印张:31

版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 - 80228 - 026 - 5/G · 059

定价:58.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国学大师论国学

(代序)

“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二十世纪初年，国内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其后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又作《国学概论》的讲演，于是国学的名称逐渐流行起来。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中国传统学术内容丰富，包罗宏广。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论学术，将学术分为三类：一义理之学，二考据之学，三词章之学。用今天的名词来说，义理之学即是哲学，考据之学即是史学，词章之学即是文学。后来注重国计民生的学者更提倡经世之学，即关于政治经济的学问。这些都是人文科学，不包括自然科学。在此之前，明清之际的方以智将学术分为三种：一质测之学，即自然科学；二通几之学，即哲学；三宰理之学，即关于社会政治的学说。方以智论通几与质测的异同，强调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有其独到之处。以上这些关于学术的分类，都未免简而未备，中国的传统学术实较此宏广。我们可以从《汉书·艺文志》的典籍目录来考察中国学术的内容。《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将书籍分为六类：一六艺，二诸子，三诗赋，四兵书，五数术，六方技。六艺是经学，包括“小学”，即文字学。诸子是哲学政治学说，诗赋及诸子中的小说家是文学，兵书是军事学，数术包含天文历法，方技指医学。在《汉书·艺文志》的目录中，自然科学及军

事学居于显著的地位，而经学居于学科之首。《汉书·艺文志》之后，传统的目录学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清代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可谓集传统目录学之大成。《四库全书总目》之中，经部是经学，包括小学；史部是史学，包括地理学；子部包括诸子、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小说以及释道典籍。集部是文学。《四库总目》将哲学、自然科学及宗教都归入子部，不如《汉书·艺文志》将数术、方技与诸子并列。总起来说，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其中最发达的是医学。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国学是本国学术之意，这是我们所用的名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就不能称之为国学了。西方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 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现在亦译为中国学。在某些西方人的心目中，所谓 Sinology 不过是对于中国历史陈迹的研究，把中国学术看作历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事实上，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其中一部分固然已经过时了，但是仍有一部分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中国学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具有历久常新的精湛内容。

—— 张岱年

目 录

尚书学	(1)
一、最早在先秦时的《尚书》	(1)
二、汉代的《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	(5)
三、东晋至唐的伪《古文尚书》	(12)
四、宋代承用伪《古文尚书》及巨大发展与疑辨	(16)
五、元明奉行宋学独尊《蔡传》及继续疑辨	(24)
六、清代推翻伪古文对《尚书》进行全面研究	(28)
七、现代的《尚书》整理与研究	(33)
史记学	(36)
春秋学	(66)
一、《春秋》和“三传”	(66)
二、汉魏时期今古文的论争和融合	(72)
三、深入和总结——从杜预到孔颖达	(76)
四、宋学和《春秋学》的进一步政治化	(80)
五、向汉学的回归	(85)
六、今文学的再起和《左传》真伪的论争	(89)
七、逐步走向科学化的研究	(92)
通鉴学	(97)
一、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97)
二、《通鉴》的价值及其版本	(102)
三、历代对《通鉴》的研究与继承	(105)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通鉴学”的发展	(111)
五、“通鉴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新发展方向	(115)
谱牒学	(117)
一、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	(117)
二、谱牒学研究概况	(123)
三、家谱的收集与研究活动	(129)

堪輿學	(132)
一、堪輿之學	(132)
二、對堪輿學的研究	(140)
三、對堪輿研究的思考	(149)
方志學	(152)
一、地方志與方志學	(152)
二、方志學專題研究綜述	(157)
三、方志目錄學	(163)
四、方志整理學	(167)
甲骨學	(172)
一、關於甲骨學	(172)
二、甲骨文的刊布和整理	(178)
三、甲骨文考釋和通讀	(183)
四、甲骨文斷代研究	(193)
五、甲骨文商史研究	(199)
簡牘學	(214)
前簡牘學時期（西漢至清末）	(215)
近代創立期（二十世紀初）	(217)
一、斯坦因的三次中亞考察	(217)
二、斯文·赫定與樓蘭簡牘	(218)
三、其他外國探險家發現的簡牘	(218)
四、近代中國簡牘學的開山之作——《流沙墜簡》	(219)
奠基期（二十世紀的三十至四十年代）	(219)
一、中瑞聯合考察團與黃文弼的羅布淖爾出土木簡考釋	(220)
二、居延漢簡	(221)
三、西北科學考察團和夏鼐的《新獲之敦煌漢簡》	(222)
發展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	(222)
一、五十至六十年代	(222)
二、七十年代	(226)
三、八十年代	(235)
四、九十年代以來	(240)
金石學	(260)
一、我國傳統金石學在考古學史上的地位	(260)
二、宋以前傳統金石學的“蘊釀時期”	(261)

三、宋代传统金石学的形成·····	(266)
四、清初传统金石学的复兴和清末的鼎盛·····	(271)
五、清末民初古器物学的形成·····	(278)
六、近代考古学方法引入后的金石学研究·····	(284)
七、新中国青铜铭文的整理、研究和著录成就·····	(288)
八、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总结和现代科技的引入·····	(294)
考据学 ·····	(300)
一、考据与考据学·····	(300)
二、传统考据学的迁演·····	(301)
三、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	(307)
四、对乾嘉考据学的再评价·····	(311)
五、近代考据学研究的进展·····	(317)
六、现当代考据学的发展及新世纪考据学的展望·····	(319)
辨伪学 ·····	(325)
一、辨伪和辨伪学·····	(325)
二、伪书产生的原因·····	(326)
三、辨伪学简史·····	(330)
四、近百年来辨伪学的发展·····	(340)
文献学 ·····	(353)
敦煌学 ·····	(378)
一、藏经洞内的稀世珍宝·····	(379)
二、令人伤心的国宝被盗·····	(381)
三、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	(384)
四、敦煌学的兴起·····	(386)
五、敦煌学的全面展开·····	(390)
六、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393)
七、“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397)
八、新世纪的敦煌学·····	(404)
郿学 ·····	(406)
一、《水经》与郿道元的《水经注》·····	(407)
二、隋唐至北宋时期《水经注》的作用与流传·····	(410)
三、金元至明清时期“郿学”的研究与学派的形成·····	(412)
四、民国以来的郿学与应用·····	(418)
五、国外的郿学研究概况·····	(422)

徐学	(424)
一、“徐学”的提出	(425)
二、关于徐霞客的研究	(427)
三、关于《徐霞客游记》的研究	(435)
徽州学	(447)
一、徽州学缘起	(447)
二、徽州学学术团体、研究机构与学术活动	(454)
三、徽州学学科建设	(457)
四、徽州学成果述评	(462)

尚 书 学

刘起钊

《尚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三个王朝夏、商、周最高统治者在政治活动中形成的一些诰语、誓词和谈话纪录等篇章的汇编，还有少数几篇是东周后期根据流传资料整理加工编定的文稿。总之，可算是研究这三代的第一手文献史料。到汉代被尊为儒家五经中最重要的一经，由史籍变为经籍。其间出现了今文古文不同本子，由此它和《左传》、《周礼》一起（加上《毛诗》、《逸礼》）引起了学术史上长期的今古文之争。到晋代又出现伪古文，纠葛更多。但不管怎样，它始终雄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宝座上，成为两千多年间首要的政治与道德教科书，给汉以后全部封建时代以巨大影响。而它的形成过程很复杂，它的经历情况也很繁乱，加上它内容中的问题成千累万，历代治《尚书》者是丹非素争执纷歧更多，成了学术史上有名的一部最难弄的典籍。现依其时间先后寻其流变轨辙，作一综贯性认识。

一、最早在先秦时的《尚书》

（一）《尚书》篇章的产生与名称的确立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君举必书。”这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的硬性规定。《汉书·艺文志》补充说明：“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郑玄《六艺论》承此说云：“右史记事，左史记言。”而《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把左右二史职掌刚好说得相反，但郑玄《六艺论》仍说“右史记事，左史记言”。其实这只是反映古代跟在统治者身边的史官随时记录着统治者的“事”和“言”。“事”就是统治者的活动，按年月记下来，就积累成编年大事记；“言”即统治者的讲话或文告（当时的诰誓辞命之类），按篇记下来，就积累成诰誓文告的汇编。前者保存至今的，有《春秋》和《竹书纪年》；后者保存至今的，就是《尚书》和《逸周书》中的一部分篇章。

当时史官对“君举”（包括言和事）必须“书”下来，“书”是指史官这一记载行动动词。结果书下来的成果也称为“书”，就由动词变成了名词。《荀子·劝学篇》：“书者，政事之纪也。”

《说文解字序》说：“著于竹帛谓之书。”吴澄《书纂言》解释说：“书者，史之所纪录也。从聿、从者。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策，曰书。”都明确说古时凡史官所纪录的东西都叫做“书”，包括编年大事记和诰誓文告等都在内。如《墨子·明鬼下》多次说“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等，在其后必紧接一句“以若《书》之说观之”，便明把各国编年史称为《书》。《左传·昭二年》晋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则《易》与《春秋》一样也称《书》，至于先秦文献中常见的“《书》曰”，确大都是《尚书》或逸《书》篇章。所以凡



周 公

(? - 公元前 1105 年)

当时史官所“著于竹帛”形成的典册，都称为《书》。此《书》字含有史的记载的意义。

到春秋战国时，史职发展，史官记载的方面广了，出现了新的不同的体裁，因而出现了新的名称。《国语·楚语》记《春秋》、《诗》、《礼》外，还有《世》（如《世本》）、《令》（如《夏令》）、《语》（如《国语》）、《志》（如《周志》）、《训》（如《夏训》）、《典》（如《帝典》）等，另有《谍》（如《谍记》）、《谱》（如《周谱》）、《系》（如《帝系》）、《纪》（如《禹本纪》等等。而编年大事记则鲁叫《春秋》，晋叫《乘》，秦叫《记》，楚叫《梲杌》等，《墨子》把它们综称“百国《春秋》”。于是原来作为各种史官记载综称的“书”，就剩下来专指“记言”的诰谟誓命之类了。“书”就由各种史籍通名，变成专指诰谟誓命等记言体的专名。而且会按其产生时代分别称为《夏书》、《商书》、《周书》。（先秦尚无“虞书”一词，《左传·文十八》出现一次，顾炎武《日知录》已辨其非。又无“尚书”一词，《墨子·明鬼下》出现一次，王念孙《读书杂志》校订为“尚者”之误。）

传至汉代，《书》为五经之一。作为《书经》，才开始由传习它的伏生系今

文家欧阳氏称为《尚书》。但先秦时的《墨子》中已屡称“尚观于先王之《书》”、“上观于《夏书》”、“上观于《商书》”等，是说向上看，看先王之书，看上古之书，已为“尚书”一词出现的先声。作为秦博士的伏生把《书》带到汉代传授，就称《尚书》。孔氏传《古文尚书·序》云：“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刘歆则指明是伏生学派首要一家“欧阳氏先名之”。可知明定《尚书》为书名的是汉代今文家。据王充、刘熙、马融等的解释，译成今语，《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

现在《尚书》包括称为诰、谟、誓、命、典等的文献。“诰”是君对臣下的讲话，“谟”是臣下对君的讲话，“誓”是君主誓众之辞，且多是军事誓词；“命”为册命或君主某种命词，“典”载重要史事过程或某项专题事实。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以事标题的（如《西伯戡黎》），以内容标题的（如《洪范》、《酒诰》）等。前人如孔颖达《疏》误分十类（比上五项多贡、歌、征、范及训五项，系取篇题末字为类，如《禹贡》、《流征》末一字，谬），刘知幾《史通》则分典、谟、训、诰、誓、命六类（“训”系据伪古文“伊训”，但先秦书篇确有《伊训》），林之奇《全解》遂以为“无以出此六体之外”，依上所举，其说亦误。其实原是统治者讲话纪录或文告，可随文体命名。惟其中有叙事较多的，如《尧典》，有不是讲话纪录的，如《禹贡》，与全书体例不一致，反映这几篇是晚于其它诸篇的后来编撰的文体。

（二）《尚书》在先秦时的流传情况

既然“君举必书”，则夏、商、周三个王朝一千几百年中他们君主们的举动是很多很多的，被史臣“书”下来的也应该很多，汉代纬书说传至春秋时还有三千几百篇，被孔子删去几千篇，只留一百篇。这是妄说，说原来书有几千篇是合情理的，但孔子删书则不是事实，因为他慨叹文献不足，传到他那个时候很难找到书篇，他尽量搜集，也不过几十篇，作为儒家经典传至汉代。同时期的墨子也努力搜集书篇，似比儒家搜集得还要多一点，但墨家的《书》篇课本没有传下来，所完整传下的只一篇《甘誓》，其余大都是《墨子》书中零散引用的一些文句。我曾综核先秦文献二十种引用《书》篇情况，得到关于《尚书》在先秦时流传情况的一些认识，现举要如下：

①先秦文献中引《书》达三百三十多次，所出篇名达五十多，其中传至汉代者二十六篇（内有十五篇在汉伏生今文中），不见于汉代者三十二篇，余则以其它称法（如“书曰”“某书曰”“先王之教”或“某人曰”等）称引者百数千次（其中自有不知篇名之篇，也有在今所知篇名中者）。篇名传至汉代见于“《书序》百篇”中而不为先秦称引者六十余篇。另有传至汉代《逸周书》数十篇中可靠为西周者约七篇，七篇外尚有二十余篇为春秋战国时加工撰成而不见先秦称引。

②秦博士伏生从秦代至汉代的今文二十八篇，在先秦被称引次数最多，可知这是当时广泛传习之本。而且他在秦时掌握的《书》篇显然主要就是这二十几篇，成了当时共习之本，所以引用也就集中在二十几篇上。

③此今文二十八篇中，《康诰》被称引次数最多，达30余次，其次《太誓》20余次，《洪范》19次，《吕刑》16次，《尧典》14次，其余皆十次以下，少至一、二次。《康诰》、《洪范》、《吕刑》都是刑政法制专篇，统治之术所在，《太誓》是武王伐纣开国宝典，《尧典》为儒家专门编造以倡“二帝”圣道王功，自然都予重视而乐于称引。

④凡所称引，大都选用一些平易好懂的句子，如《康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太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洪范》“三人占，从二人”，和后代文句差不了多少，而《尚书》中大量典型的“佶屈聱牙”的句子，他们都避不引用。其实重要篇章在周初诸诰，由于它们用周初岐周方言，至春秋战国时已经不通用，已无法在一般宣传论辩中引用了。

⑤先秦诸子引用《书》篇，彼此纷歧也很大。例如儒家墨家都有《甘誓》，二者中心内容核心文句都相同，但全文文句有很大不同。即使墨子一家引用同一篇书，文句也有差异，如《非命上、中、下》三篇都引《太誓》，文句各有差异。与儒家《孟子》、《左传》所引《太誓》差别更大。这是彼此据竹简传抄以及传习中的变异造成的。

⑥当时引《书》，以《左传》次数最多，达80余次，引篇名共达十三篇。其次《墨子》达47次，二十二篇。其余依次递降。《左传》记政治人物言行，引《书》自然最多，而诸子中独墨家与儒家竞相称引《书》篇（儒书《礼记》引43次，《孟子》引38次，《荀子》《国语》各引20余次，《论语》8次）。此外法家《管子》6次，《韩非子》7次，道家只《庄子》2次。就看出当时的显学儒墨两家的重视《书》篇，儒家且与《诗》成为本学派两种主要课本，终于引起了法家的焚禁。

⑦各家引用书篇都为自己的学说服务，作为自己学说古已有之的凭据，如果文献不和自己学说一致或没有可利用文献时，就干脆自己编造古文献。当时儒墨两家就干得最出色，纷纷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先王尧、舜、禹等，故《韩非子·显学篇》揭露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儒家所塑造的尧、舜、禹，在他们所编造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中，以及《论语》、《孟子》中来称誉。他们尽量运用了古史遗存，凡远古各种神话和传说资料，远古天文历象资料，社会部落联盟活动中的遗迹资料等等，借了尧、舜、禹、稷、契、皋陶、伯夷等许多古代不同时期和不同氏族传说中的祖先或神话人物，集中安排到一个朝廷里，成为同时存在的君臣和兄弟，又都是理想的圣人，作出很多美政，使人感到美好的黄金时

代尧舜盛世早已存在于远古，大家一心向往就行。《禹贡》则是当时地学家的一篇名作，儒家把它加了头尾，作为大禹治水分州的作品，配合《皋陶谟》，遂成继尧舜后的一个圣王。我国上古史体系就由这几篇经典的威力确定下来。司马迁撰《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就全抄《尧典》加上战国末编造的《帝系姓》、《五帝德》二文构成；第二篇《夏本纪》，则全抄《禹贡》《皋陶谟》两篇再加上《甘誓》及《世本》中的世系构成。儒家这三篇创作就构成我国最早的古史了。这几篇近于纪事体，与《尚书》全书之“记言”体裁不一致，到宋时已有人据此怀疑其真实性，经明清及近人疑辨，最后由顾颉刚先生考定大都成于战国之世。按，最早也不过春秋之世据一些旧史料撰成，然后知此古史体系是儒家运用此三篇建立的。

在秦王朝“焚书坑儒”政策下，《书》与《诗》被作为主要焚禁的两部书被禁毁，不得流传，唯博士官所掌者获保存。

二、汉代的《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

（一）西汉伏生学派的今文三家《尚书》

秦博士伏生当汉初乱定后，从屋壁中取出所存秦官本《尚书》二十八篇，用以授徒于齐鲁之间。弟子有名者二人：张生和欧阳生。汉文帝时派太常掌故晁错前往觅取《尚书》，将二十八篇抄回献入秘府。因是隶书写的，以别于其后出现的古文本，故称“今文”。汉武帝时立伏生门人欧阳生的曾孙欧阳高为《尚书》学博士，宣帝时增立张生一系的夏侯胜及其从侄夏侯建亦为博士，于是成为汉代《尚书》学的今文三家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之学。

伏生所传是二十八篇，但汉武末年民间出现一篇《太誓》（称后得《太誓》），三家取以入其传本中，故伏生学派立于学官的今文三家所传《尚书》是二十九篇。王充《论衡》记此事甚明确，并谓当时把二十八篇比做二十八宿，《太誓》比作北斗，表示《尚书》篇数是由天象所定的。今文二十八篇篇目如下：

《虞夏书》：（1）《尧典》（2）《皋陶谟》（3）《禹贡》（4）《甘誓》

《商书》：（5）《汤誓》（6）《盘庚》（7）《高宗彤日》（8）《西伯戡黎》

（9）《微子》

《周书》：（10）《牧誓》（11）《洪范》（12）《金縢》（13）《大诰》（14）《康诰》（15）《酒诰》（16）《梓材》（17）《召诰》（18）《雒诰》（19）《多士》（20）《毋佚》（21）《君奭》（22）《多方》（23）《立政》（24）《顾命》（25）《鲜（费）誓》（26）《吕刑》（27）《文侯之命》（28）《秦誓》

后得《太誓》实际是汉人在五行灾异思想笼罩下所伪造的一篇“伪今文尚书”，马融已列举先秦散传《太誓》文句不见于此篇，因而指出此篇非先秦时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太誓》。

（二）西汉形成的汉代今文经学特点

西汉今文经学在其活动过程中，形成了几个显明的特点，构成汉代整个今文经学的特色。

①经学神学化。阴阳五行说是汉代的宗教神学，作为神学目的论的天人感应机祥灾异之说成了人们的共同信仰。儒生们都方士化了，就以这种阴阳五行灾异感应之说释经。大夏侯氏学派撰有《洪范五行传》、《五行论》等以五行灾异曲解《洪范》，更有一《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系统全面地宣播阴阳五行说下的经学。至刘向撰《洪范五行传论》、刘歆撰《五行传说》，归结为班固的《汉书·五行志》，先引述《洪范》及《五行传》中一段文字，接着记录灾变，议论史事。于是整个中国历史永远跳不出《洪范》五行的圈子，成为所有人们看待宇宙、看待社会、看待历史、看待人生的指导思想。就从《洪范》衍出了支配人们两千多年的神学史观，经学成了神学的“侍婢”。更宣扬《洪范》九畴（即篇中九节文字）

是上帝叫神龟背负着在洛水上授予大禹的“洛书”，与《易》八卦为上帝叫神马背负着在黄河上授予伏羲的“河图”，并成为两件汉儒所膜拜的神物，在经学中有崇高的地位。

这样神学化的经学自然孕育出纬书。《申鉴·俗嫌论》说纬书是中兴以前发生，即是说新莽之世出现的（另有说出于哀平之世，误。因其时刘向、刘歆整理图书未见此）。纬书伪称是为各经解释奥义而作，除保存有先秦至汉的天文、历法可贵资料及一些地理、农业生产、史事、典章制度零散资料外，大量篇幅是神



董仲舒

（公元前176—前104年）

灵、怪异等浅薄迷信的荒诞的“怪、力、乱、神”的东西，而其思想灵魂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阴阳五行说。纬书的出现，只是汉代今文经学神学化不可避免的堕落。它和原来就有的浅薄迷信的“图讖”紧密结合为浑然一体的“讖纬”，反过来自称为“秘经”，为“内学”，贬经学为外学了。

②通经致用。汉王朝需要儒学为他服务，便特别强调“通经致用”，“以经术缘饰吏治”。《廿二史劄记》卷二说：“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即指此。于是有所谓以《春秋》断案，以《诗》三百篇当谏书，以《禹贡》治河，更多的以《洪范》五行之说预言时变，论断政事，乃至用于求雨、止雨，等等。他们的“致用”往往是可笑的，往往是愚蠢的，但却使儒生这个队伍成了汉王朝特别需要的一群。顾颉刚先生《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指出：“皇帝有什么需要时，儒生们就有什么来供应。这些供应，表面上看都是由圣经和贤传里出发的，实际上都是从方士式的思想里借取的。”原来他们的“通经致用”，是由上一个特点经学神学化所规定着、制约着的。而“通经致用”以获最大成功的，就是王莽利用这样的经学顺顺当当地取得汉家天下。

③繁琐与空疏。汉代知识平庸的经师，面对艰涩难懂、佶屈聱牙的《尚书》，拿了学官厚禄，就只好强不知以为知地去解释。或者望文生义，或者用离题万里大绕圈子的方式来掩盖其无知，于是就写出许多繁琐的“章句”、空疏委琐的“传”、“说”，以及乌烟瘴气的阴阳五行解说。今文三家大抵如此。而尤以小夏侯氏为最。典型的例子是《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夏侯氏学的秦恭“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该志从而指出今文经学是：“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知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谈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这种经学的结果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现在所能见到的伏生这一派张生、欧阳生等门徒传习所撰成的“传”“说”经义之书，唯有《尚书大传》，和《诗》的《韩诗外传》一样，都是远离经文，或用一二句经文为引子，驰骋与经文毫不相干的杂说，说明这样的经说，繁琐空疏到了极点。

④严家法师法。汉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十四家，博士弟子要严守本师所传一家之学。《后汉书·儒林传》载明“五经博士各以家法传授”。《尚书》今文三家博士就要各按三家之一的家法传授，《汉书·儒林传》载孟喜被荐补博士，可是因“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可见家法师法是国家保障的，不许有所背离。但对师说可以引申、发展，叫做“增师法”。另外为了捍卫本师本家门户，还可拒绝承认别人也属这一家。汉宣帝时曾开过石渠阁五经同异会议，就是为确立家法保障家法而召开的。说到底，是为了保障“禄利之路”。

（三）西汉出现《古文尚书》及刘歆请立于学官失败

西汉立于学官的“五经”，是秦博士所传由小篆改用隶书写成的官方定本。

当时由六国用未改隶书前的古文书写藏在民间的经籍或有出现，当是无可疑的。因此，《尚书》就有古文本出现，见于记载者有下列几次：

第一次，《史记·儒林传》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这是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承其先世所传下来之本。

第二次，《汉书·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名诰》脱简二。”此所谓“中古文”，就是皇家中秘府所藏《古文尚书》本（皇家藏《尚书》有二，一是晁错抄进的今文本，一则如刘歆说孔安国献上之古文本）。

第三次，《汉书·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修学好古，……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这部《古文尚书》一般称“河间献王本”。

第四次，《汉书·儒林传》载：“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文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乃黜其书。”这是第一次明确编造的伪《古文尚书》。所谓“百两篇”，即所造经文百篇，加上所编各篇“书序”综为两篇。于是有了所谓“百篇《书序》”（实共六十三序，因有数篇合序。以此六十三个序记明一百篇古文篇题）。张霸的百篇伪书虽被废黜了，但所造“百篇《书序》”（据《左传》及《史记》中叙书篇成立情况再加凑合写成）却流传盛行起来，并宣称是孔子所作。这就成了《尚书》学史上的大事，张霸的创作变成了真事。其实《孔子世家》只说“孔子……序书、传”。“序”本是排列之意。张霸却利用此语伪造孔子作了《书序》。从此历代奉为经典，直到宋儒才怀疑这问题，现在基本弄清楚它的实际，百篇的“书序”并不是孔子所作，而出于“百两篇”。

现录编造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即虞夏20 商周各40）《书序》所列百篇《尚书》篇名如下：

《虞夏书》二十篇：

- (1)《尧典》(2)《舜典》(3)《汨作》(4-12)《九共》(13)《稷沃》
- (14)《大禹谟》(15)《皋陶谟》(16)《弃稷》(17)《禹贡》(18)《甘誓》(19)《五子之歌》(20)《胤征》

《商书》四十篇：

- (21)《帝告》(22)《嫫沃》(23)《汤征》(24)《汝鸠》(25)《汝方》
- (26)《夏社》(27)《疑至》(28)《臣扈》(29)《汤誓》(30)《典宝》
- (31)《仲虺之诰》(32)《汤诰》(33)《咸有一德》(34)《明居》
- (35)《伊训》(36)《肆命》(37)《祖后》(38-40)《太甲》
- (41)《沃丁》(42-45)《咸父》(46)《伊陟》(47)《原命》